

通过民间、政府、公司、教育界、媒体的自发性和有组织的多种多样的努力，曾经被严重撕裂的种族伤痕慢慢平复了，洛杉矶依然变得更大更繁荣。而 King，后来也获得洛杉矶政府 380 万美元的民事赔偿，开了一个小建筑公司，而他原来曾经有过多起小犯法的过失。

## 【书 评】

# 读《为什么餐厅里的黑人孩子都坐在一起》

——兼论对构建中国和谐族群关系的启示

阳妙艳、常 宝

《为什么餐厅里的黑人孩子都坐在一起》(*Why are all the Black kids sitting together in the cafeteria?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about race*) 可谓塔特姆 (Beverly Daniel Tatum) 教授集多年研究经验的累积之作。作为美国杰出的临床心理学家，她为促进美国社会不同种族之间的对话做出了不少努力。正是因其孜孜不倦的学术努力与经验实践，早在 1997 年，她受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参加关于种族问题的全国讨论会 (national conversation)。

作为美国种族分类系统中的一名黑人女性<sup>1</sup>，塔特姆教授以犀利的眼光感知了种族隔离现象在美国社会的日常呈现：走进任何一所种族混合中学，不难发现，餐厅里的黑人孩子都坐在一起。然而，塔特姆教授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层的感知上，她颇有启发性地提出了质疑：餐厅里的白人孩子同样坐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当黑人孩子坐在一起的时候，更会引起众人的注意？这同样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在该书中，塔特姆教授以种族歧视为制度背景，以种族认同发展过程为线索，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种族关系的实质，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促进不同种族对话的设想。本文中，笔者将首先介绍该书的基本内容，然后简单对于该书的基本思想进行一个简要的评价，最后讨论该书的基本思想对于构建中国和谐族群关系的启示。

## 一、“种族歧视”是一种体系优势

传统的定义都将“种族歧视”与偏见联系在一起，塔特姆教授以为，这种定义其实是对“种族歧视”的片面理解。借用大卫·魏尔曼 (David Wellman) 的解释，塔特姆教授指出，种族歧视其实是一种基于种族类别之上的体系优势。它可能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偏见性表达，但是某些种族类别却先天性地享受着某些体系优势：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更好的住房条件，更好的工作等等<sup>2</sup>。这一定义引导读者去理解，种族歧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并不仅仅是基于种族偏见之上的个体意识形态，更多地是，基于体系之上的各种文化观念、政策和实践以及由个体信仰和行为。

然而，“种族歧视”的标签经常会引起白人的愤怒，他们认为这对自己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种族歧视的情绪。而且，他们可能会质疑，难道有色人种就没有种族歧视吗？塔特姆教授指出，如果我们将种族歧视定义为种族偏见，那么，答案是肯定的。黑人确实对于白人也有偏见，这有历史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但如果将“种族歧视”定义为体

<sup>1</sup> 对于塔特姆而言，与其说种族是一种事实存在，不如承认其社会建构性。尤其在族际通婚日益增加的全球化以及移民背景下，种族制度以及话语的惯性使得那些混血儿以及白人领养家庭中的有色孩子处于“认同困境”。

<sup>2</sup> Tatum, B. D. (1999). *Why are all the Black kids sitting together in the cafeteria?":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about race.* New York: Basic Books.p7.

系优势，那么，答案是否定的。白人，不管意识或者无意识，都享受着种族歧视带来的优势。

塔特姆教授将种族歧视分为两种类型：积极的种族歧视，即公然，有意识的种族歧视；和消极的种族歧视，即轻微的种族歧视，比如当别人讲一些种族主义的笑话时，会笑出来，但不会挑战现有的不平等结构。而塔特姆教授一直以来的努力目标，则是将更多人从积极种族歧视和消极种族歧视转到积极的反种族歧视。

塔特姆教授指出，虽然所有白人都是种族歧视的受益人，但是这种受益并不均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性取向以及精神和身体健康程度等等都会对此产生影响。换言之，个体具有多重的社会角色，每一社会角色都会有主导与附属之分，可能个体在这一角色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另一社会角色中处于附属地位，各种社会角色以及随之衍生的角色地位之综合造就了个体目前的社会状况。这也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白人都处于社会上层的原因。在塔特姆教授看来，种族是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社会角色之一。这一角色决定了个体在种族分类体系中的地位，比如，黑人与有色人种在美国社会的附属地位。塔特姆教授指出，纵使黑人与有色人种这一“词语”本身，就带有白人的“主控”色彩，因为“白”本身也是一种颜色。

## 二、在白人的背景中了解黑人特质

在美国这一总体性社会中，白人从人口上占大多数；而且，从种族话语权来看，白人的话语形塑并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种族话语表达以及建构，并对黑人的种族认同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因此，了解黑人特质，往往是在白人背景中展开。塔特姆教授以种族认同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发展为线索，揭示了黑人种族认同的发展过程、遭遇以及可能的引导途径。

### 1. 学前的困惑：我的皮肤是棕色，是因为我喝了巧克力奶吗？

虽然家长经常觉得小孩是“肤色色盲”（colorblindness），然而，事实却是，即使是三岁的孩子都能够意识到比如肤色、头发以及面部特质等体质差异。孩子的表达方式有时候往往会超乎父母的想象。

比如塔特姆教授在书中讲到，有一次，她的大儿子回来问她，“妈妈，我同学艾迪（Eddie）说我的皮肤是棕色是因为我喝了很多巧克力牛奶，是真的吗？”

塔特姆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回答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引导有助于孩子建立正面和积极的种族认同。美国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确实有一段惨痛的历史。讨论种族问题不能简单地回避这一伤痛的历史。但是家长或者老师也要同时留意孩子的认知能力以及发展阶段。塔特姆教授指出，对于那些教授殖民历史的老师来说，在让学生告诉白人殖民黑人历史的同时，要看到时代的转变以及发展的前景。

再以塔特姆教授为例，对于上述问题，她采取了巧妙的回答，“不是真的，是因为你的皮肤里面有黑色素。黑色素很重要，它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受太阳的伤害。艾迪也有黑色素，还记得有一次艾迪去了佛罗里达，之后他的皮肤变黑了。是黑色素使他的皮肤变深了。每个人都有黑色素，但是有的人比别人要多。在你学校，你的黑色素是最多的。”<sup>1</sup>

### 2. 中学阶段的种族认同：为什么餐厅里的所有黑人学生都坐在一起？

走进任何一所种族混合中学，不难发现，餐厅里的所有黑人学生都坐在一起，然而，走进种族混合小学时，情况变得极为不同，不同种族的孩子可能会在一起玩游戏或者一起吃零食。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现象？塔特姆教授认为，一般来说，在步入青少年的时候，黑人学生开始反思自己的种族身份认同。

心理学家威廉·克罗斯（William Cross）把种族认同发展分为5个阶段：前遭遇、遭遇、浸

<sup>1</sup> 同上，p33-34.



入/凸现、内化、内化-承诺。塔特姆教授认为前两个阶段跟青少年最相关<sup>1</sup>。前遭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种族成员身份的个体和社会重要性并没有被意识到，种族认同也没有得到反思。在这一阶段，黑人吸收了白人主导文化的价值观念。白人优等的观念通过刻板印象、忽视和曲解等得到强化。遭遇阶段主要体现为促使个体意识到种族歧视的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涌现。个体开始意识到作为种族歧视目标对象的内在含义。比如，当白人过生日时，黑人不会受到邀请；或者当白人和黑人约会时，会遭遇到来自两方群体的压力。

种族歧视往往会导致对立认同的发展。美国学者西戈尼亚·福德汉（Signithia Fordham）和约翰·奥布（John Ogbu）在研究非洲裔高中学生认同发展时曾指出：当黑人学生意识到体制的排斥时，他们会表现出愤怒和怨恨，从而不去参与美国社会的活动，最终导致了对立认同的发展。对立认同发展的一个表现，就是将成绩好与白人联系起来，聪明成为冷酷的对立面。这就给那些成绩好的黑人学生带来极大的认同困惑。他们或继续被刻板化为“模仿白人”（act like White），成为不在餐桌边的黑人学生；或归队到黑人的群体中，扮演学校中的“酷”学生。

如何在这一阶段引导积极的种族认同？塔特姆教授首先指出了课程的重要性，即教授黑人的光荣历史。这一历史，不是被“白人化”（Whiten）的历史，而是一个客观实在的黑人发展史。让黑人学生知道，黑人历史上，除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马尔克姆（Malcolm X）和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还有更多成功的人士。同时，塔特姆教授也以某一学校的个案提出了餐桌边的其他选择：即在中学学校开展学生效率训练项目：要求学生每天以小组的形式与两位工作人员见面，聊他们的家庭作业，社会问题以及种族歧视的遭遇。通过这种群体的经验共享与共鸣，黑人学生一方面有一种共同分享经验的途径；另外一方面，也可共同探讨建立积极的对话路径。

### 3. 成年期的种族认同：仍在进展中

步入成年期后，种族认同仍然在进展中，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后三个阶段的特点：浸入/凸现阶段：这一阶段的注意力集中于自我发现，个人正在忘却内在的刻板印象，并重新定义积极的自我；接下来是内化阶段，个体对于自己的种族身份有一种安全感。在这一阶段，个体也愿意去与其他群体的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内化-承诺阶段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在这一阶段，个体开始将种族认同转变成为关切群体的行动。当然，不会每个人都会经历每个阶段，后面两个阶段也不仅仅只发生在大学。塔特姆教授指出，不管是在第四还是第五阶段，个体都处在一个积极的认同位置。比如，就有研究表明，在黑人占主体的学院或者大学读书的黑人学生学业表现要比在以白人为主体的学院或学校读书的黑人学生好。在前述的学院或者大学里，黑人学生强调感受到感情卷入、接受、支持以及鼓励<sup>2</sup>。

总体来说，种族认同发展的过程，一般是从青少年期开始，直到成年期，仍然在进行中。这一过程，与其说它是线性的，还不如说它是循环的。所以，在中年期以及中老年期等不同的阶段，种族认同都存在着。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在公司的餐厅：黑人员工依然坐在一起。

## 三、在白人的背景中理解黑人特质

### 1. 白人认同的发展过程——我没什么种族，我是正常人

在以白人为主体的主导的社会背景中，白人可能并不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反思自己的种族背景和身份。白人似乎认为，种族认同只有其他人才有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显著的。这也是为什么塔特姆教授在向一位白人女性提问“你有什么种族背景？”时，她会回答说，“我没什么种

<sup>1</sup> 同上，p55.

<sup>2</sup> 同上，p75-80.



族，我就一个正常人。”<sup>1</sup> 但是不管怎样，理所当然的认同或者没有认同的认同也是一种潜在的认同。白人种族认同的发展过程开始被揭开。

借用加内特·何姆（Janet Helm）的框架，塔特姆教授指出，建立一个健康的白人认同一般有6个阶段：接触、解体、重组、假独立、浸入/凸现以及自治。这一建立主要有两大任务：抛弃个人种族主义歧视；反对制度性的和文化性的种族主义情绪<sup>2</sup>。

在“接触”阶段，白人很少留意他们种族认同的显著性。就如上述“我就一个正常人”所展示的那样。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白人主导社区的人，他们将这种白人优势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将对有色人种的社会刻板印象内在化。他们很少意识到社会化的过程<sup>3</sup>。

“解体”，主要表现为在个人经历中明显感受到种族的社会重要性，从而意识到种族歧视以及白人特权。对于部分白人来说，解体开始于当他们和有色人种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或者恋爱关系时；也可能源于他们看到某些种族事件，如警察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或者参加一个“抛弃种族主义”工作坊的结果<sup>4</sup>。

一些问题一旦被指出来，就很难去忽视。重组开始于强烈的释放感。在这一阶段，之前的负罪感可能会转变成对于有色人种的害怕和愤怒。逻辑是：“如果种族歧视是一个问题的话，有色人种肯定做了某些坏事。如果改变你们的行为的话，这些问题就会消失。”

“重组”阶段的不快与愤怒部分源于被视为群体中的成员而不是独立个体。虽然有色人种很早就感知自己被他人视为群体的成员（这一群体往往是种族，更明确地说，黑人群体），但是白人更愿意相信个体作为白人特权合法者。这种视自我为个体的观念与个体主义以及择优录取的神话相符合。将种族歧视视为体系优势不仅危及了社会的信仰而且危及了个人成就的信仰<sup>5</sup>。

在“假独立”阶段，当白人对于体制种族歧视的理解加深时，他们就不太会责备体制的受害者了。相反，这种深入的理解会导致个体去抛弃个人的种族主义歧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协调这些事情。因此，在这一阶段，个体可能会避免与有色人种建立某种关系，以免麻烦<sup>6</sup>。

“浸入/凸现”阶段是重新定义白人特质的阶段。负罪感渐渐褪去。在最后一阶段，自治阶段，个体将新定义的白人特质纳入成为个体认同的一部分。重新定义以及积极的情绪赋予个体以力量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情绪和压迫。自治可以被描述为“种族的自我实现”<sup>7</sup>。

当然，种族认同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六个阶段也不是排他性的，只能说在某一个过程某一特征占据了主导位置。

白人认同发展过程的展示给黑人的最大启示是：寻找白人盟友，重拾希望。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白人：为了黑人的自由和独立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因此，种族歧视格局的打破，不能忽视白人盟友的力量。

## 2. 白人认同和肯定性行动：我只在肯定性行动跟我工作没有关系的时候才支持它

肯定性行动，按照塔特姆教授的介绍，最早在法律系统中出现是在1965年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签署的11246号总统行政命令<sup>8</sup>。这一命令要求联邦承包商采用肯定性行动保证不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者国别来雇佣员工或者对待员工。1970年代，这一立法将残疾人以及越战老兵也纳入受保护群体。就塔特姆教授的理解而言，肯定性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政治家交叉使用肯定性行动与配额，或许是有意地导致这种定义的混乱。而配额这两个字

<sup>1</sup> 同上，p93.

<sup>2</sup> 同上，94-95.

<sup>3</sup> 同上，p95.

<sup>4</sup> 同上，p96.

<sup>5</sup> 同上，p101.

<sup>6</sup> 同上，p106.

<sup>7</sup> 同上，p111.

<sup>8</sup> 按照王凡妹的介绍：肯定性行动首次出现是在1961年3月5日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签署的第10925号总统行政命令（U.S. The White House, 1961）中（王凡妹，2009）。



本身就带有辛酸的歧视与排斥的历史。举例来说，在 20 世纪早期，配额是用来限制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sup>1</sup>。所以，肯定性行动中模糊的定义以及过程导向，并没有导致黑人群体受惠。

美国社会中白人对于肯定性行动的态度是微妙且复杂的。有人认为肯定性行动是对于黑人的一种基于种族分类的政策照顾；有人认为是对于过去歧视与排斥的一种现时弥补；对于部分人来说，肯定性行动是对于白人的不公平对待；对于部分人来说，肯定性行动可以接受，但前提是不能将肯定性行动施加在自己身上。在塔特姆教授看来，最后一种态度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塔特姆教授回顾自己的教学经历，提到这么一个故事，在给 学生指定一些关于肯定性行动的读物之后，她要求学生写一篇对于肯定性行动的认识与看法的文章。有一个年轻的白人学生写道：“我只在肯定性行动跟我工作没有关系的时候才支持它”。

就塔特姆教授的理解，美国目前的肯定性行动是一种“过程导向”型行动。“过程导向”致力于创造一个公正的申请过程，假定公正的过程会导致公正的结果<sup>2</sup>。就理论层面来说，似乎是没有问题的，跟美国“择优录取”的理想不谋而合。美国的大部分白人也支持这一措施。然而，就作者的亲身经验而言，“过程导向”会导致那些有色人种候选人“太优秀而不能录取”的局面。比如，在她曾经任教的某一大学，学校的有色人种老师特别少，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有色人种候选人要不就被认为不“符合要求”，要不就“太优秀，即使录取了，也呆不了太久”，所以一开始就干脆不予录取。所以，塔特姆教授认为，要保证事实上的“公正”，要采取“目标导向”型行动。“目标导向”肯定性行动也提供一个公开化的过程，但是，当有一批合格的候选人时，那些能够将组织推向多元化目标的候选人将被录取。目标导向的肯定性行动的实际意义在于，能确保有色人种享受真正的平等机会。

#### 四、黑白之外

种族歧视的话语分析似乎总是关注于白人—黑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然而，在美国的多种族多族群关系体系中，其他有色人种/族群也同样有着被剥夺和压迫经历。在对 拉丁语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以及亚太裔美国人（亚裔以及太平洋岛民）的移民历史以及社会地位进行探讨时，塔特姆教授发现，种族以及文化压迫成为他们过去以及现在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对于处于群体中个体的认同发展产生了影响<sup>3</sup>。种族歧视，已然超越黑白之外。

##### 1. 当我们在说“拉丁”的时候，我们在指射什么？

拉丁语裔美国人，通常也叫西班牙裔美国人，是美国第二大有色人种群。目前美国大概有 25 00 万名 拉丁语裔永久居民。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高移民率，拉丁语裔人口可能会在 21 世纪初期超过非洲裔美国人口，从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有超过 60% 的 拉丁语裔美国人有墨西哥血统，13% 的有波多黎各血统，5% 的有古巴血统，20% 的为其他，包括多米尼亚移民、以及新近的中美洲移民和南美洲移民。这些移民群体都与美国有着历史性的关系<sup>4</sup>。

拉丁语裔是一个比较庞大而多元的群体，一般来说，波多黎各裔是所有拉丁语裔群体中最穷的，贫困率将近 60%。古巴裔美国人是富裕的。这可能与古巴裔美国人的移民历史有关，由于政治的原因，古巴裔美国人的第一批移民大部分是卡斯特罗统治下的上层精英。对于 拉丁语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还在于对于“非法移民”的标签。虽然大部分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是合法居民，但是美国社会习惯性将墨西哥裔定型为“非法移民”。

不管怎样，拉丁语裔作为一个以地域命名的群体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根据塔特姆教授的介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家庭的重视，家庭关系网络对于 拉丁语裔在美国社会的生

<sup>1</sup> Tatum, B. D. (1999). *Why are all the Black kids sitting together in the cafeteria?: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about race*. New York: Basic Books.p116.

<sup>2</sup> 同上, p117.

<sup>3</sup> 同上, p132.

<sup>4</sup> 同上, p133.



存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是对于西班牙语的语言认同。大部分的拉丁语裔美国人的母国都是西班牙语国家，西班牙语在拉丁语裔认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在移民早期尤其明显。然而，在美国社会中，语言危机带来了新的认同危机。理查德·罗德里格（Richard Rodriguez）——《记忆之荒》的作者，曾经提及自己作为拉丁语裔的儿时经历，他说，“为了促使学生更快地学会英语，学校告诫父母在家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说西班牙语。从此之后，孩子与家庭开始停止交流。”<sup>1</sup> 在现实社会中，有一些学生，为了避免受到白人学生的冷落，极力掩盖自己的种族/族群特质。有的学生表示，他们会努力学习白人的英语口语，而假装自己不会讲西班牙语。然而，避免使用西班牙语也不能保证被主导社会所接纳。极为吊诡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母语的熟练程度对于其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有直接的影响<sup>2</sup>。在一个母语被迫自我否定的环境中，如何建立积极的种族认同，这是拉丁语裔美国人面临一大困境之一。

## 2. 当我们在说“印第安人”的时候，我们在指射什么？

印第安人有一段辛酸的被迫同化的历史。从1879年开始，美国政府为印第安人建立远离保留地的寄宿制学校，强迫印第安人孩子远离家庭，接受美国主流文化教育；这一政策于1930年代被扭转，但是在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强制同化之后，好几代的印第安孩子错失了学习他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机会，与此同时，虽然他们被灌输了美国主流文化，但无法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从1940年代至1950年代，这种政策又开始转变。许多印第安人被强制从家园搬迁至城市地区。

在20世纪初期，印第安人人口增速很慢。然而，在20世纪下半期，印第安人口急速增长，这部分源于高出生率和低婴儿死亡率；部分源于1970年代，相当数量的人在人口普查表中将其种族身份由其他的类别改成印第安人的事实。这一转变的“自我认同”再次牵出了这么一个经典问题：谁是印第安美国人？这一类别又是如何定位的？这一问题决定于被问对象。每个印第安部落有不同的评价成员资格标准。有的指定特定比例的印第安血统（比如1/2到1/64）；有的要求会讲本种族语言等。而美国政府有时候要求1/4血统，有时候要求自我定义<sup>3</sup>。

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由于较高的族际通婚率以及多元的体制特征，已经很难从外貌上探察谁是“印第安人”。印第安文化，由于被迫同化的历史以及各种其他社会原因，也已经流失了好多精髓。同样，美国课程中对于“印第安人形象”的忽视和曲解将进一步加深印第安人的认同危机。

## 3. 当我们在说“亚裔”的时候，我们在指射什么？

亚洲裔美国人通常被视为美国社会的“模范少数族群”。他们刻苦工作，沉默，少抱怨，教育水平高，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社会中上层，总而言之，他们是成功的一个群体。然而，这种模范形象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首先，它给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第安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克服了歧视，为什么你们不能？这种信息导致了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第安人对于亚洲人的恶感；同时，由于亚裔人士的成功，给白人带来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也导致了白人的憎恨。在美国的历史上，反对亚裔的运动并不少见。

同时，作为模范少数族群也是需要承受代价的。首先，模范少数族群的评价忽视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忽视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虽然相对高比例的亚裔处于高收入水平，但是有25%的越南人处于贫困水平，这远高于国家13%的比例；老挝和柬埔寨更高，分别为35%和43%；教育也是同样的情况，尽管总体水平相对较高，但是内部差异很大。其次，个体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社会所忽视。比如，由于亚裔学生的数学被普遍认为比较好，那些数学成绩不好的亚裔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纵使对那些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而言，成功也是需要代价的，有些同学表示，为了提高数学成绩，他们会以牺牲其他功课成绩为代价<sup>4</sup>。再次，在公共政策领域，“沉默、少抱怨”的评价往往忽视了他们的真正需求，因为主流社会会认为“没有声音就是没有问题。”

## 4. 多种族家庭的认同发展——难道孩子就不承受代价吗？

<sup>1</sup> 同上，p139.

<sup>2</sup> 同上，p142.

<sup>3</sup> 同上，p144.

<sup>4</sup> 同上，p159-162.



虽然对于种族认同以及族群认同的探讨很多，但是对于多种族家庭中混血儿以及白人领养家庭中非白人孩子认同的探讨并不多。

塔特姆教授指出，混血孩子的族群认同发展，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有许多的客观条件需要考虑，比如，家庭的种族组合是怎样的，黑人—白人，白人—亚裔人，亚裔人—黑人还是黑人—印第安人？孩子的体质特征是怎样的，明显的黑人特征，亚裔人特征或是白人特征还是不明显的体质特征？家庭状况怎样？父母是否都参与了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如果不是，主要参与者是什么种族身份？父母鼓励怎样的种族认同？孩子住在一个怎样的社区：种族成分单一还是混合的？多种族家庭在这一社区很普遍还是非常少？<sup>1</sup>

纵使如此，美国社会的种族分类结构也深深地影响着这两类孩子的种族认同发展。比如，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一滴血法则”（one drop rule）被普遍运用到黑人的分类评价中：只要有非洲血统，就可以被归类于黑人。这种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些双种族认同或者多种族认同的人。白人领养家庭非白人孩子的种族认同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话题。从体质特征来说，他们被归类于有色人种；从家庭环境来说，他们的父母是白人，有可能被灌输的文化也是关于白人社会的。由于体质的差异，他们可能会面临着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的矛盾。那么，“我到底是谁”对于他们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

尽管社会背景一直在变化，美国社会的种族分类历史以持续的合法性影响着种族认同的过程。因此，“种族”与其说是一个生物学的词汇，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建构物。虽然我们可能从地理和体质上把人种给区分出来，但是，在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种族已经很难找寻了。然而，社会的事实却是，美国的白人与非白人的界限是非常分明。

## 五、打破沉默

在最后一章，塔特姆教授以“打破沉默”为标题，意在从“促进跨种族对话”的角度来促进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从而促进双方对于目前种族结构的理解，最终减少“沉默”对于双方的代价。

塔特姆教授指出，沉默对于双方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对于白人来说，种族偏见与种族歧视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对于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恐惧，从而导致了不同种族群体的隔离；另外，种族的态度也反映在对于族际通婚的态度上，由于父母对于族际通婚的不支持，也有可能带来代际关系的不稳定。对于有色人种尤其黑人来说，体系的歧视导致他们中大多数人处在社会的底层，处在被主导的附属地位。因此，塔特姆教授提出了对话的方式来促进两方的沟通。然而，她并没有对于如何对话进行详实的解说。

## 六、评价与总结

塔特姆教授以一个临床心理学家的视角，以“种族认同发展”的教学经验，以作为“黑人”的个体体验，为读者展示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以及个体种族认同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全书的整体框架来说，塔特姆教授的考虑是比较周全的：她不仅从美国的主体背景中去理解黑人认同的实质；也去揭示白人认同的实质；她不但揭示出黑人在种族歧视体系中所承受的代价，也分析了白人所付出的心理代价；传统意义上的关于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研究，主要关注白人—黑人之间的关系，塔特姆教授不仅对前述关系进行了实质上的剖析，也对美国社会的其他有色人种及其移民历史以及社会地位进行了探讨。其次，书中贯彻着两条线，一条线是美国社会的种族分类系统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歧视；另一条是种族认同发展的过程。前面一条是背景线，后面一条是个体认知线。塔特姆教授以一个心理学家的经验，将后面一条线有的放矢地穿插到种族歧视的背景中，

---

<sup>1</sup> 同上，p167.



帮助读者去了解美国种族歧视的实质以及个体种族认同的发展的过程。再次，塔特姆教授所借用的“种族歧视是一种体系优势”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她巧妙地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即使白人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情绪，他们从体系上享受着“种族身份优势”；第二，这种体系优势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它决定于个体处在社会中的多元角色：个体的性别、年龄、职业、性取向、身体和精神健康等角色都对此产生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种族身份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塔特姆教授不是在一个静态的背景中去理解种族认同，而是在动态的环境中把握种族认同的实质，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够指出混血儿以及被领养的非白人孩子的认同困境。最后，塔特姆教授提出的“促进跨种族对话”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美国的执政者，这也是为什么她于1997年受到当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接见。

然而，塔特姆教授一书的缺陷也是显见的。她提出的“促进跨种族交谈”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性策略”，加之她对于如何促进交流进行引导，这种“个体性策略”的群体动员力量是有限的。

种族歧视，与其是一种个体话语，还不如是一种体制建构。笔者以为，种族歧视话语的引导，也无法脱离体系话语的引导。在这里，政府话语、媒介语言以及其他公共话语的重新再定义是不可缺少的。种族歧视的扭转，需要制度上的拯救。

## 七、对于构建中国和谐族群关系的启示

塔特姆教授这本书中的基本思想对于构建中国和谐族群关系具有非常实际的启发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有56个族群，共有80种以上语言，约30种文字<sup>1</sup>。根据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理解，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费孝通，1989）<sup>2</sup>。马戎教授则认为，中华民族的构建要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局面（Ma，2007）。然而，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族群关系遭到了一些新的挑战，“拉萨3.14事件”以及“新疆7.5事件”等事件的发生对于中国应当如何调整族群政策、如何构建和谐族群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以为，不管是“多元一体格局”还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在新的社会时期处理中国多民族关系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不仅要在中华民族背景中来了解少数民族群，也要在中华民族背景中来了解汉族。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55个少数民族群占总人口的10%不到。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就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文化核心的统一的多族群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朝代，中原王朝周围族群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历经几千年的战争、迁移、通婚和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人口融合之后，今天中国各族群已经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族群国家，形成了既有各自特点又有统一共性的现代族群共同体。

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看，汉族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是这个多族群政治实体的核心。无论人口、地域、文化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历史以来汉族不断影响和改变着周围少数民族群。因此，中国族群研究和族群关系问题的主体背景是人口众多、拥有悠久历史的汉族多数群体。理解和分析汉族群体认同及其对其他少数民族群的观念和看法时，不仅从汉人的整体文化特点、综合指标来把握，更重要的是对其地域性特点、群体内部的认同分化和不一致性进行细致入微的了解，这样才能够真正理解汉族群体认同的实质，也能揭示少数民族群认同的内在结构。

由于中国汉族人口众多，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一部分汉人中也存在塔特姆教授所观察到的，类似于美国白人“我没什么种族，我就是个正常人”的认同和观点，更具体地说，多数汉族人

<sup>1</sup> 转引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笔者将引述中的“民族”改为“族群”。

<sup>2</sup> 费孝通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一体”的解释有一个逐步修正的过程。根据马戎的介绍：费孝通逐步把“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的涵盖面从“汉族”扩大到了中华民族的其他群体。费孝通在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曾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两年之后，他在武陵山的考察时提出，许多群体都参与了 this 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马戎，2008）。





一般没有明确、清晰的“自我认同”或对其他族群的理解，更多是“漠不关心”或者“毫无兴趣”。广大汉族农民、民众是这类人群的代表。对于大多数汉族精英来说，很多人对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有所了解和关心，甚至有些人怀有“好奇心”，但在探讨少数民族政策，涉及到汉族与少数民族利益关系时，多数人仍坚持“跟我工作没有关系的时候才支持它”的态度。可见，我们不但分析和揭示中国少数民族在以往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族群制度性、结构性差异中所承受的代价，也要分析汉族群体内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心理认同以及所付出的代价，这样才能避免以偏盖全的态度，使族群关系研究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关系研究只关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移民历史、文化融合、人口同化、社会流动等宏观层面的关系，只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整体性弱势地位出发，强调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整体性压制和歧视等问题，没有对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进行实质上的微观剖析，从而研究结果仍停留在简单的、刻板印象阶段。

其次，贯彻族群优惠政策的同时，要同时注意被忽略的汉族弱势群体。所谓的“优惠政策”，是国家在制度层面上制定的目标和行动方向，国家政策目标与社会实践与实际效果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距。这可能由于实施政策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远远超于政策想像的缘故。其结果，在理论上没有问题的政策，在实际过程中不仅无法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达不到预期目标，反而引发或者加强其他矛盾、冲突。

中国当代针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优惠政策”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但在“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和争论。其中，对“优惠政策”之公平性问题，包括汉族精英在内的很多人提出质疑，对其进行了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如今，时代改变了，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的基本矛盾都发生了变化，在国内族群关系政策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矛盾，人们对以往政策的质疑更为激烈，包括汉族精英和一部分少数民族精英对于“优惠政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且复杂的变化，认识到“优惠政策”对于汉族人的不公平对待。在我们看来，像美国“肯定性行动”一样逐渐成为“过程导向”型行动，这是在中国族群研究和族群关系政策的制定中，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变化。

无论哪个国家实行的族群“优惠政策”，其最终目的必定是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从目前情况看，在新的社会变动和发展前景中，以往以“族群”为单位实施的“优惠政策”显然无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这时，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态势，探讨改善族际关系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这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具体而言，以“族群”为单位的“优惠政策”将汉族整体视作为“优势”或“强势”群体，忽略了汉族内部的弱势群体，从而引起汉族内部弱势群体的不满和抵触，“优惠政策”无法达到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目标，反而带来了新的冲突。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提倡的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在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的确发挥了巨大积极作用。但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汉族和少数民族同样面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竞争，这一政策已无法发挥其正面功能。例如，在一位在北京出生的少数民族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与一位在农村出生的汉族农民的子女之间哪一个更应该获得“优惠待遇”的问题上，以“族群”为单位的“优惠政策”就失去其解释权和合理性。因此，“优惠政策”应注意汉族群体内部的弱势群体，这样才能够建立社会公平性标准，有利于社会整体性稳定。

再次，要关注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发展和演变，同时要注意其差异性。在中国族群关系和社会发展历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类型、迁移制约和族际交往历史等原因，我国各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和行政联系的紧密程度在近代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势，有的(如满族)几乎完全融入汉人社会，有的(如藏族)曾长期保持相对自



治的状态。<sup>1</sup> 从而各少数民族之间对汉族的认同，乃至当权国家的认同程度上出现巨大差距，国家政策制定上应看到族群之间的文化、经济等宏观差距的同时还要了解族群之间的认同、个体行为等微观层面的不同。

即使是同一个族群，其内部的差距和分化程度是不同的。就像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或领养所产生的“混血儿”现象一样，中国各族群之间虽然没有美国那样的种族差别和区分，但族群通婚后的子女在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上仍存在“认同危机”和困惑，同样会面临着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的矛盾。这是同一个族群内部不同家庭之间的差距。在同一个族群内部成员地域上的不同也产生差距，又如上一个例子中的，一位在北京出生的少数民族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与一位同一个族群在农村出生的农民的子女是否应获得同样程度的“优惠待遇”的问题，在现有的“优惠政策”中也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

最后，要时刻关注媒体和政府用语，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文化多元主义”者，在多族群国家中经常提倡“承认”、“平等”和“解构”的理念。不同族群之间应该相互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平等”，对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解构”中找到少数民族其一席之地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信任。尊重历史，就是要尊重用各种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如果为了某种哪怕是最合理、最正当的理由，故意忽视或回避历史事实或某些文献来进行当代的“历史建构”，那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从长远来看也不会取得好的社会效果。<sup>1</sup>

每个族群对本族的传统文化、宗教、历史及英雄人物都怀有深厚的认同和情感。在新的社会媒体、舆论环境下，那些古老的传统和传说，以历史的记忆和历史文物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常常在新的解释和论证下获得新的内涵及动员效果。在多族群国家“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与实践中，媒体和政府话语应对其给予合理、正确、正面解释，从中让少数民族成员获得应有的“自信”和社会声望、地位，以消除多数汉族在少数民族心目中的“体系优势”。

总之，塔特姆教授的这本书，从宏观角度对美国社会的种族分类系统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歧视进行的详细论述和从微观层面对种族认同发展的过程的讨论，使我们看到宏观与微观视角的巧妙结合，启发颇深。让我们在中国族群关系研究中获得了通过族群背景解释认同、揭示实质的崭新视角，使我们在中国族群政策的制度性、结构性环境下，易于回答在族群成员个体、群体、地域与职业等角色上呈现的多元、复杂现象的本质意涵。

（作者介绍：阳妙艳，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常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 参考文献：

- [1]Ma, R. (2007). A New Perspective in Guiding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 in China, *Asian Ethnicity*, Volume 8, Number 3.
- [2]Tatum, B. D. (1999). *"Why are all the Black kids sitting together in the cafeteria?":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about r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3]费孝通, 1989,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4]马戎, 2009,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 [5]马戎, 2008,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 [6]王凡妹, 2009, “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 载《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总第53期（内部刊物）。

---

<sup>1</sup> 马戎,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